

聚焦平昌：冬奥反思及趋势研判

【编者按】：体育界至今还未曾有常设的体育评论栏目，一门学科的发展，应该有评论的支撑。热点事件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往往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体育学术界应该关注社会现实，对热点问题作出回应，发出有分量的声音，并起到引领性、导向性的作用。基于此，我们尝试推出学术评论性的热点事件聚焦专栏，本期推出聚焦平昌。平昌冬奥会期间，卢元镇教授作为体育界专家，应邀接受了CCTV5频道的多次采访，对中国冬奥代表队作出客观的点评；学者房学峰身临其境，近距离观察了主要场次赛事；央视主持人洪钢全程跟踪并解说了主要场次的比赛。他们对平昌赛事感触良多，其观点对于我们透视平昌冬奥会的种种现象，更好的理解我国冰雪运动发展态势，以及中国冰雪竞技实力水平，从而有针对性的备战北京-张家口冬奥会，大有裨益，将由此引发许多引人入胜的话题、论题和专题，给学术界从学识、学理上进一步探讨该命题提供了足够大的空间。故本刊从2018年第一期起，广邀高朋于斯，纵论平昌及北京冬奥，欢迎诸位学人予以关注，更期待参与讨论。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909（2018）01-0071-05

短道速滑是一项有严重缺陷的运动项目

卢元镇

（华南师范大学，北京 100084）

短道速滑是一项有严重缺陷的运动项目。短道速滑是一项在极小的密闭空间内进行，而规则又极其不严密、裁判极难公正执法的高速竞速项目，因此，这个项目极易造成运动员伤害事故，也极易产生赛事纠纷。

短道速滑场地的周长是111.12m，半径8m，以女子500m的速度为例，大约要达到11.5m/s，这几乎相当于一群汽车、摩托车在一个周长只有200m的跑道上竞速，焉有不出事的道理。在本届平昌冬奥会上看到无数次运动员身体相互接触、碰撞，以至摔倒，撞到边墙，相互踩踏，其景象惨不忍睹，让人惊心动魄。

在比赛中，运动员有几乎一半的距离在做高速圆周运动，为克服离心力，身体必须做达到极限的侧倾，身体失去平衡甩出的情况便经常发生。短道速滑还有如下规则与裁判漏洞难以治理：一、运动员的出发状态不公平。每次比赛有4至8名运动员同时上跑道（本届还有一赛次高达9人），站两排，而出发的站位对比赛的结果影响极大，虽有分配站位的规定，但裁判员可有一定的随意性和倾向性，造成比赛的不公；二、后方运动员超人既可在右侧也可在左侧，这无论交通规则还是其他竞速运动项目都是罕见的，这就造成了难以说得清楚种种的问题；三、接力场面的混乱制造了裁判的困难与观赏的乱象。接力本身没有明显的物体交接，很难判断是否完成。四队8名运动员交织

在一堆进行高速运作,很难看清细节;四、高科技手段很难介入裁判工作。现在已有 6 台高速摄像机监控比赛,但事实上,运动员前后左右都有犯规的可能和嫌疑,靠一台摄像机在一个节点上监控多名运动员是难以有作为的。与排球、网球的鹰眼不同,短道速滑不可能中断比赛,对裁判的判罚做出及时的判断。而且摄像监控设备越多,比赛后回看的时间就越长,空场纠偏尴尬的程度也就越高,竞赛的成本也会随之增加。

而且多台监控设备还会产生副作用,它反而使个别裁判员的故意误判、反判容易找到借口。当裁判眼中看到的東西与电视转播的焦点,与现场观众的观察点总是有差别时,比赛的可信度,裁判的可靠度必定会遭到质疑。

在本届赛场上看到了历届最多的起跑犯规,比赛中的违规判罚,运动员个人的或集体的摔,有的八人比赛甚至最后只剩一两个人通过终点,这些都是极不正常的现象,比赛中还多次出现了让运动员、教练员、记者观众莫名其妙的场景,这更是国际竞技运动罕见的。说明短道速滑的改革已迫在眉睫。否则将会影响到它在奥运会上的生存。

运动竞赛的惊险刺激,决不能以赛场的混乱、争议作为代价,也不能无视运动员的生命安全,当然更不能把现场观众与电视观众都当做盲人和傻瓜。

国际滑联正在把速滑运动带到一个正确的方向

房学峰

(中国冰球协会,北京 100000)

一个比国际奥委会的历史还要悠久的国际组织,正在奥运会上陷入中国媒体和公众的围攻,这是一件很有趣意思的事情——众所周知:国际滑冰联盟(ISU)是 1892 年成立的,国际奥委会是 1894 年成立的;世界速度滑冰锦标赛是 1889 年开始举办的,而现代奥运会是 1896 年开始举办的。

基于我浅薄的历史知识,我认为需要换一种站位去认识速度滑冰运动,一个关键问题在于:ISU 要把速滑运动带到哪个方向上去?

1 两种速滑文化和短道速滑的发展

首先要建立的认识是:荷兰成为速滑王国不仅是因为他们的运动员从格雷诺布尔开始赢得的金牌,更是因为如今世界性的体育竞赛是从阿姆斯特丹开始、并且从速度滑冰开始的。

但从一开始,就有两种速度滑冰的文化:一种是欧洲式的、古典式的、长跑道速滑式的,即运动员按照规定的线路滑行,不能发生身体接触(古典式越野滑雪其实也是这样);另一种则是北美式的,即像田径比赛那样集体出发——1932 年第一次普莱西德湖冬奥会、也是北美举行第一次冬奥会的时候,速度滑冰比赛就全都是集体出发的。

但欧洲式速滑仍然掌握着这个舞台的话语权,因此在很长时间里,速度滑冰没有改变。

七十年代中期,短跑道速滑开始在北美发展,这两个原因:第一是场馆因素,能进行花样滑冰和冰球比赛的室内体育馆越建越多,为速滑运动员提供了进行成本日趋低廉的训练和进行比赛的可能性;第二是文化因素,即集体出发的北美速滑文化——在美国人看来,这样的比赛形式更符合他们的体育比赛理念、也更有兴趣。

于是在长跑道速滑世界锦标赛创办八十多年之后,又诞生了短跑道速滑的世界锦标赛。

新的速滑方式和新的比赛除了在北美受到欢迎之外,另一个积极参与其中的国家是日本,恰好这个项目蓬勃兴起的时候也是中日两个国家关系如胶似漆的时候,于是日本人出钱出力出技术,把

这个项目介绍到中国来。因此,我们还需要建立一种基本认知:中国短跑道速滑能具有较高水平,原因之一是几乎和世界其他国家同步发展,并且适时地得到了国家层面的支持,虽然得到这种支持的过程中,有些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于是在大约三十年前(李琰在奥运会表演项目中战胜加拿大双栖明星Sylvie Daigle的那时开始),两种速滑文化都在奥运会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古典的、欧洲式的长跑道速滑仍然是主角,如今在奥运会上有14个比赛项目,现代的、北美式的短跑道速滑则是一个活跃的配角,像是长跑道速滑和花样滑冰中插足的“第三者”——长跑道速滑有自己专属的比赛馆、等于有自己的“家”,短跑道速滑则是用花样滑冰比赛馆、等于是趁男主人不在的时候去别人家里。

2 两种速滑文化的融合

不够强壮但足够聪明且矮小灵活的亚洲运动员,很快在短跑道速滑上发现了自己的天赋:韩国和中国。到今天,短跑道速滑因为场地容易获得、比赛易于举办且观赏性强等原因,在世界上得到了非常好的发展,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冬奥会项目。而更重要的是:短跑道速滑对于其他冬季项目产生着良好的示范作用。

本届冬奥会上一个特别值得观赏的项目是长跑道速滑的集体出发比赛,这是冬奥会的新项目,可以认为是长跑道速滑中终于融入了短跑道速滑的这种北美式文化。

历史最悠久的滑雪竞赛是1925年开始的世界越野滑雪锦标赛(北欧滑雪世界锦标赛),它也接受了这种北美式文化,其短距离集体出发个人赛在2002年进入冬奥会(举办地是北美冬季运动的重镇和速滑运动的圣地之一盐湖城)、2001年进入世锦赛,短距离团体赛则在2005年进入世锦赛,2006年进入冬奥会。

这届冬奥会上,美国运动员破天荒地赢得了越野滑雪比赛的金牌,而这个项目一向是北欧人的天下,如果不是增设了这种集体出发的项目,美国人甚至都不会对此感兴趣——获得金牌的选手之一是今年将满36岁的Kikkan Randall,她是第一位在世界杯系列赛中进入前十名的美国运动员,也就是说:没有这个符合美国体育文化理念的项目进入奥运会,不会有太多美国选手愿意选择从事这项运动,更谈不上坚持多届、直至夺取金牌的这个故事了。

这种项目文化彼此融合促进、进而改变奥运会竞赛版图的故事,在冬夏奥运会上实在是太多了,这里只谈速滑,就不涉及其他了。

而长跑道速滑的团体追逐赛,是2006年进入冬奥会的,这又是冬夏奥运会项目彼此借鉴融合的结果,因为这个项目明显是采取了场地自行车比赛的赛制,是被人们发明出来的项目而不是古典的项目。

3 短道速滑的改变方向

平昌冬奥会的贡献之一,是长跑道速滑重新赢得了广大观众,这中间的因素很多,但赛制的改造与创新肯定是重要因素之一。

那么短跑道速滑应该向何处去呢?

就赛制而言,它有三个可能的方向:

一是向诸如混合接力的方向。但恕我直言,我高度质疑这样发展的意义(理由限于篇幅就不一一说了),与其说是混合接力,我觉得还不如设混合团体;二是向诸如自行车计分赛或者长跑道速滑集体出发(本质上也是计分赛)的方向。如果不这样的话,世锦赛3000米个人赛那样的项目很难被奥林匹克接纳;三是向长跑道速滑的反向融合,即设置没有身体接触的团体追逐赛或者个人追逐赛。

就规则而言,我认为也有两个方向:

一是对故意犯规的惩罚。在这方面,我认为中国运动员在高速摄影时代,给世人的印象未必都是良好的,就像如今足球比赛中的“假摔”那样:一开始是聪明的前锋骗点球的做法,甚至能算一种“智慧”,但如今,“假摔”被视为违反体育道德的欺诈行为,一旦被认定,是可以直接给黄牌甚至红牌的。

二是对“阻挡犯规”和“打手犯规”的惩罚,就像篮球比赛中那样。这种犯规,往往是具有较强实力但不具有绝对实力的选手做出来的,而为了取胜、甚至只是为了赢得金牌而采取这种做法,的确会将这项运动带到错误的方向去。

因此在我看来,本届冬奥会短道速滑比赛的严肃规则,是ISU试图让这个项目向正确方向发展的一种值得肯定的做法,与此相关的则有这样两件事。

其一,如果中国不能成为规则的制定者、掌握者、主导者,不拥有解释权的话,就应该好好研究规则的变化,并且努力去适应规则,更要尊重规则(这里得说明一句:该申诉的时候还是要申诉)。

其二,媒体和公众不应该把对中国队成绩的期望,建立在“中国仍然是世界最强队”这样的假设上——查一查这个周期各项世界大赛上各国选手的成绩就可以给中国队的实力一个合理定位,我不说现在不代表我不知道现在,而是偏要举过去的的数据:1998年长野冬奥会中国队没有获得金牌是必然的,那个周期里中国队得到过一些世界冠军但没有绝对优势;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得到金牌也是必然的,那个周期里中国队在所有世界大赛上的表现,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不管怎么说,在“公共领域”层面质疑规则和指责国际组织是没有意义也没有必要的,不管在本届冬奥会的比赛时中国选手能获得几块金牌,我们都要警惕某种“强国梦”里的“弱国心态”……



图1 国际滑联决定公布作为裁判判罚依据的图片
Figure 1 The International Skating Federation decides to publish a picture that is used as a basis for judges

平昌归来话冬奥

洪 刚

(中央电视台,北京 100020)

2018年2月,为了报道冬奥会,我们来到了距离朝韩边境不到百公里、东面日本海(韩国称东海)、坐拥太白山的这片陌生土地。

据韩国韩联社报道,韩国央行和财政部表示本次冬奥会期间,总消费1.4万亿韩元(约合13亿美元),将促进韩国GDP有0.05~0.06个百分点增长。韩国政府对此应该是满意的,谁也不会指望在赛时就把冬奥会的巨大投资收回,某些投资可以说是用于冬奥会,也可以说不是单用于冬奥会。比如投资37亿美元兴建的首尔至平昌高速铁路,江原道所受之好处当然不仅仅在冬奥会这短短的19天,着眼于未来的滑雪度假业发展,这条铁路将不断发生效益。

再比如平昌冬奥五大科技中的5G技术,韩国电信在平昌、江陵一带铺设了1.1万公里的通信及

电视转播线路，架设基站集群，搭建了完善的5G网络环境。据报道，其传输速率达到20Gbps，比4G LTE技术快40~50倍，系统容量增加100多倍。2018年被认为是5G商用的重要一年，相关产业链投资也将开启，光通信所包含的光纤光缆、光模块、光设备市场据测算将有至少50%的增长。这不限于韩国，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市场。

2011年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发布的《平昌冬奥会创造的经济效益》报告指出，与奥运会相关的投资和消费支出可能创造21.1万亿韩元（约195亿美元）收益，而后冬奥时代10年间产生的间接经济效益将达到43.8万亿韩元（约405亿美元）。在投入方面，平昌奥组委透露政府预算支出2.8万亿韩元，加上基建投资，整体预算14万亿韩元。有报道认为，其实际需求可能达28万亿韩元。要知道，俄罗斯为主办索契冬奥会投入高达500亿美元，所以无论怎么算，平昌都是办了一届非常“省钱”的冬奥会，而笔者对它的判断是：有赚无赔。

索契冬奥会投入于安保的费用高达30亿美元，本来，韩国人所面临的东北亚紧张局势丝毫不比当年的亚速海轻松。安全，是所有赛会的第一要务，即使是在温哥华，也发生了格鲁吉亚雪橇运动员库玛里塔什维利在赛道训练中严重受伤、最终身亡的不幸事件。虽然本次冬奥期间也有传染病病毒等事件影响，但从朝鲜决定派运动员参加冬奥会的那一刻起，半岛上空所有阴霾都暂时消弭。利用开幕式和闭幕式，韩国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冬奥外交，来到平昌的各国元首或元首代表、特使和里约持平，仅仅从朝韩半岛旗入场这一幕，平昌冬奥就已经成功了。

再来说一说比赛本身。冬奥开幕之际，韩国媒体就心平气和地指出“这从来都是欧洲人的盛会”，无论是参赛运动员数量还是水平，欧洲都在冬奥会上占居主角位置。即便是美国，也在本届冬奥会上实现着我们常说的“突破”——迪金斯和兰达尔夺得越野滑雪女子接力冠军，使越野滑雪的奥运金牌第一次离开欧罗巴。

事实上，雪上项目的魅力很大，从92个IOC中有80个参加阿尔卑斯滑雪、65个参加越野滑雪就可见一斑。经笔者推荐的人去过雪上赛场之后无一后悔，电视机前感慨雪上比冰上好看的人也不在少数。“三亿人上冰雪”，其实冰上的容量是有限的，而雪上的容量是无限的，在响应19大号召，办好2022冬奥、冬残奥的基础上，如何打开我国冬季项目比赛、观赏、产品、娱乐市场，是未来的长期话题。

冬奥项目总的来看，危险性、偶然性都比夏奥项目要大得多。雪上运动、雪车雪橇等项目的户外运动性、赛道唯一性、极限速度性都决定了这些比赛中的偶然。例如在阿尔卑斯滑雪中，莱德茨卡爆冷成绩仅赢了亚军0.01秒，男子小回转近四届世锦赛冠军全部失误，包括世界杯全能总冠军六冠王希尔舍，而领先的克里斯托弗尔森同样在压力下第二轮失误。越野滑雪产生的首金卡拉、美国队的女子接力也是冷门。再优秀的运动员单场比赛也没有50%以上的夺冠把握。

冬奥比赛中有冷门是某种必然，没有冷门才是真正的冷门，所以高手们对结果都看得比较淡，然而奥地利名将希尔舍还是刷新了笔者的认知。阿尔卑斯滑雪历史上从没有人能单届夺得四项冠军，上次有人拿到三冠也发生在半个世纪以前，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似乎是个不小的荣誉和诱惑，然而希尔舍两冠在手的情况下，竟然不参加奥地利队有可能夺冠的混合团体。笔者认为，常年和大自然为伴、和伤病为伴、和冒险挑战为伴，这些运动员早已超越了参加一项运动就是要争金夺银的初级体验，这难道不是体育的终极目标之一吗？

科技助力奥运训练：形势、进展与对策

陈小平

(国家体育总局 体育科学研究所,北京 100763)

【摘要】:围绕科技助力奥运,服务训练,分析了我国竞技体育面临的形势与任务。研究认为:从上届巴西里约奥运会中国代表队的金牌数出现明显下滑形势看,我国竞技代表队将会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前有美国、俄罗斯强大对手围追,中有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竞争,后有东道主日本堵截。分析了强大对手在竞技训练硬件、软件方面的三位一体格局以及完整、系统、科学的训练环节,指出当前我国科技助力奥运训练的三大主要任务:1.科学的顶层设计;2.构建科学化训练团队,提高科学对训练的引领作用;3.探索竞技训练的科学化发展之路。

【关键词】:竞技;训练;科技;东京奥运会;里约奥运会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909(2018)01-0076-07

“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一个展现人类能力、运动科技和全球交流的巨大实验”^[1]。这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前期“自然”发表的题为“团队科学”文章的卷首语,该文从心理、流体减阻、兴奋剂检测和疾病防控等领域阐述了奥运会运动成绩背后的科技成就,再次诠释了奥运赛场不仅有运动能力的比拼而且也有当代科学技术的角逐。

然而,我国竞技体育尽管也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从科技的角度仍然明显落后于世界水平,竞技运动训练长期仍然处于高投入和低产出的粗放式发展模式,科学化训练水平不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为此,我们在参考了以往我国奥运备战训练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紧密结合近年来世界竞技体育的发展态势,对我国科技助力奥运训练的当前形式和任务进行梳理、分析和研究,以期发现问题、找到短板并给出建议。

1 2020东京奥运形势分析

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奖牌成绩表明,我国竞技体育的整体出现明显下滑,金牌和奖牌总数的世界排名较大幅度降低,是近5届奥运会(2000~2016年)的最低水平。

然而,与我国成绩下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英国和日本等国家奖牌数量和世界排名的快速上升。英国以27金、23银和17铜的成绩位列里约奥运会金牌排名第2,其奖牌总数超过作为东道主的伦敦奥运会,不仅创造了近50年英国参加奥运会的最佳成绩,而且打破了奥运东道主优势可以延续3届奥运会但逐届下降的“规律”^[2]。作为下届奥运会东道主的日本在里约奥运赛场上也展现出强劲的气势,其金牌数和世界排名均达到近9届奥运会的第二高水平,而奖牌以41枚的总数达到9届奥运会的的最好水平。从历史上看,日本曾经在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上,以16金、5银、8铜的成绩紧随当时体育强国美国和原苏联之后位列金牌世界第三,由此可以推断日本作为东道主在下届东京

收稿日期:2018-01-03

作者简介:陈小平(1956-),男,山东武城人,教授,博士,博导,研究方向:运动训练学。

奥运会的比赛中必将全力争取金牌和奖牌的优异成绩。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在里约奥运会,同样是世界竞技体育强国的俄罗斯队,由于受到兴奋剂禁赛,相当一批项目并没有发挥其正常水平,一些项目甚至没有参赛,而在下一届奥运会上他们也势必全力以赴争取优异成绩。

因此,我国在下届东京奥运会上无疑将遇到比里约奥运会更加严峻的形势,不仅仍然要与美国和俄罗斯等传统体育强国抗衡,还要面临英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等近年上升势头强劲国家的冲击,同时也必然受到作为东道主日本的全力挑战。在此背景下,我国竞技体育界应该清醒认识东京奥运会面临的严峻形势,必须重新检查和评估现有竞技体育管理和运行体系,采取相应的强有力并且高效的应对措施,以确保我国在东京奥运会上杀出重围,取得优异成绩。

2 世界竞技运动训练科学化新进展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人类发展永不枯竭的动力来源。大量奥运成功的事例都已经证明,科学研究是运动成绩和训练水平快速提升的强大引擎。尤其近十年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和可穿戴设备等高科技技术的强劲引领下,世界竞技训练科学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

美国STATS公司研制的无标记智能化运动跟踪系统“Sport VU”已经运用于包括NBA、NFL和NHL等多个职业联盟的比赛和训练^[3],该技术能够追踪每一名球员的速度和距离(总跑动距离、场均跑动距离)、触球和持球(总触球次数、场均触球次数、篮下触球次数、肘位触球次数、场均持球时间、每次触球得分)、传球(总传球次数、场均传球次数)、场均助攻机会、场均助攻创造得分、防守影响力、篮板机会、突破、接球投篮、运球投篮、投篮效率等多项球类项目关键指标。该技术运用的最大作用在于对球类项目复杂技术的无标记视频捕捉和智能化快速处理,其结果不仅对技战术训练具有重要指导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复杂球类项目运动员训练负荷的个性化精细设计、实施和控制成为可能,为长期训练计划的制订和短期运动状态的调整建立了基础和依据,提高了训练效率,降低了运动损伤风险。

科研、训练和保障(恢复、心理、营养等)“三位一体”的无缝衔接与充分融合,是近年世界竞技运动训练发展的另一个显著特征,也是当前欧美竞技体育强国普遍采用的训练模式。该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竞技训练科学化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数据就没有计划,没有测试就没有训练。”这是美国Michael Johnson Performance(MJP)训练中心主任马克·普瑞尔(Mark Pryer)博士在介绍该基地训练情况时多次强调的理念,也是美国、日本、英国和挪威等国家多个训练基地的共同特点。所谓“三位一体”是指训练、科研和保障三部分的紧密衔接和高度融合,这种衔接和融合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1)硬件设施的“三位一体”:训练设施(包括专项训练和体能训练)、科研设施(智能化快速反馈力学测试装置和设备)以及营养、康复和心理等保障设施的集成化安排。MJP将耐克数字跑道、橄榄球数控跑台、Kistler三维测力台和技术影像反馈系统等高科技智能化测试装置安装在训练场地,随时监控运动员训练过程中的技术、力量、耐力和协调能力的变化,为运动员每一次的练习设定明确和量化的训练目标,为教练员的训练计划提供数据支持。在美国国家体能训练中心,培训教室就设置在训练房中,运动员和教练员随时可进行理论学习与实践训练的切换。在达拉斯小牛篮球和牛仔橄榄球队的训练场地,以专项训练、体能训练、康复训练为主体模块,从准备活动到身体放松形成“一个屋檐下”的训练系列,非常醒目的是装置了开放式厨房,营养师在训练过程中根据运动员的消耗随时进行食品和运动补剂的补充。在斯坦福大学的体能训练馆,康复师的人数超过教练员,康复床位达到30多个,同时还拥有先进的脑神经科检测设备,其橄榄球和对抗类项目的运动员随时可以进行脑颅检查,把脑损伤防患于未然。

(2)软件的“三位一体”:现代高科技技术的介入“倒逼”教练员的科学化训练水平,也改变了

科研人员传统的实验室工作形式。“没有测试就没有训练”不仅是MJP的一个口号,而且已成为欧美体育强国竞技训练中无所不在的训练模式。多种现代化训练设备的操作,对数字跑道等测试数据的认识和掌握,基于科学检测的训练计划的制订,对教练员和训练管理人员的自身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具备认识和掌握这些科技信息的人(教练员和管理人员)显然已无法胜任他们的工作。“三位一体”的训练也改变了科研人员传统的工作方式,将以往阶段性的实验室检测变为每一节训练课的场地测试,将以往的后期分析报告变为即刻快速反馈,将以往的科技服务变为训练参与。同时,“三位一体”的训练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单兵作战”模式,对教练员、科研人员和保障人员之间的协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运动员为核心、以提高竞技表现为目标、以训练效率为标准的团队训练已经成为当代竞技训练的发展趋势。

(3)完整、系统和科学的训练环节:经过长期的互动与磨合,“三位一体”的训练表现出典型的分站“流水线”式的训练模式。以美国MJP的训练为例,他们在训练上设计了从准备活动到放松整理一整套的“训练站”,其中各个训练环节都运用了现代高科技的技术并充分考虑兼顾到后续的流程。例如,当运动员进入训练营地后,首先在活动室内进行神经肌肉状态、睡眠状态和体成分等运动员身体状态测试,教练员通过这些指标了解运动员的现实机体状况,完善和修订后续将要进行的训练内容。在训练中,他们运用先进的各种训练设备,例如与耐克公司合作建立的“数字跑道”,对运动员跑步时的运动学和动力学数据进行采集、处理和快速反馈。又例如他们还根据橄榄球运动员跑动距离较长的情况,设计了专门的测试跑台,根据球类项目运动员极其重要的平衡能力特点,设计了可以测试左、右侧力值的测力装置。这些高科技设备可以即刻获取运动员训练过程中每一次练习的数据,并且可以即刻快速反馈,不仅可以进行训练—评价—再训练等测试与训练的频繁交互,提高训练针对性和个体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给出每一次练习(一节课)和多次训练(若干节课)同一动作的细微变化,教练员可以从中获得技术、体能、疲劳甚至伤病等大量动态信息,作为制定和修正训练计划的依据。在训练之后,他们还进行包括冷、热水浴和各种身体整理手段在内的整理和放松活动,康复师、营养师和心理师均参与其中。

“三位一体”的训练模式引领了当代竞技体育发展的新潮流,它虽然并不是类似于“鲨鱼游泳服”或“Klap冰鞋”的重大创新发明,但却全面并深刻地影响甚至颠覆了整个竞技运动训练。这种被称为“一个屋檐”下的训练,将以往阶段性的实验室工作转变为日常每一节训练课的现场测试,在宏观上分析机体负荷—疲劳—恢复—增长的过程,对长期训练计划进行系统综合的科学指导,在微观上捕捉每一次练习的运动学和动力学变化,对具体的训练方法和手段给出快速即刻的客观评价。同时,“三位一体”的训练对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职业要求,要适应这种趋势就必须改变传统的单一和分离式的训练模式,就必须在组织、管理和运行上建立科研、训练和保障“三位一体”高度融合的协作机制。专项教练员、体能教练员、科研人员以及各种康复、营养和心理保障人员如何既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在目标和作用上准确定位形成集约和高效,是当代训练,尤其是世界高水平运动员训练成功的关键。

3 当前科技助力奥运训练的主要任务

有研究认为,科学研究不仅是影响竞技体育国际竞争力的9大因素之一,而且其对竞技体育的支持主要显现在运动员进入高水平训练的阶段^[4](见图1)。当运动员经过多年训练已经达到世界水平时,其运动能力日益接近身体极限,此时运动成绩的提高出现缓慢而运动损伤的风险则明显增大,运动员对训练负荷、方法以及运动器械和装备的个体性和科学化要求大幅度提高,科技助力成为这一阶段成就运动员从世界一般水平到顶尖水平的决定性因素。以近年来令世界瞩目的英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为例,“科技”始终是英国高水平选手奥运登顶的核心因素,里约奥运会英国93%奖

牌的获取都得到英国国家体科所的支持^[5]。其中最典型的是先后投入3000万英镑对赛车和服装进行科学研究的自行车项目,该项目明确提出“如果可以通过科技提高1秒,那么就绝不通过训练”,坚定贯彻以科技引领训练的路线,在连续3届奥运会中共获得22块金牌和38枚奖牌,分别占金牌总数的29.33%和奖牌总数的21.22%,不仅当之无愧地成为英国奥运的龙头项目,而且也充分显示了科学研究对奥运成绩所具有的重大推动作用。

因此,面对当前的严峻形势,我国竞技体育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敢于打破原有的传统管理体系,构建具有战略高度的整体发展计划,尤其是要以科技助力作为备战奥运训练的主要突破点,加强国家队高水平运动员的科学化训练投入,将科技作为登上奥运最高领奖台的最后一步。

3.1 科学的顶层设计

世界竞技体育的发展已经证明,勇于开拓创新的思想、科学缜密的顶层设计和系统严谨的组织管理是取得奥运佳绩的思想、体制和组织保障。因此,我国科技助力奥运,尤其是以奥运会等重大国际赛事为具体目标的科技助力,首先必须构建一个国家层面并具有战略高度的“顶层设计”。该设计要建立在充分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要敢于突破传统体制的束缚,大胆引入职业化、市场化和社会化机制,聚集全社会的力量,构建真正意义上的举国科技助力奥运体制。同时,该设计还应兼顾长远和当下的训练发展,既要有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又要解决当下奥运备战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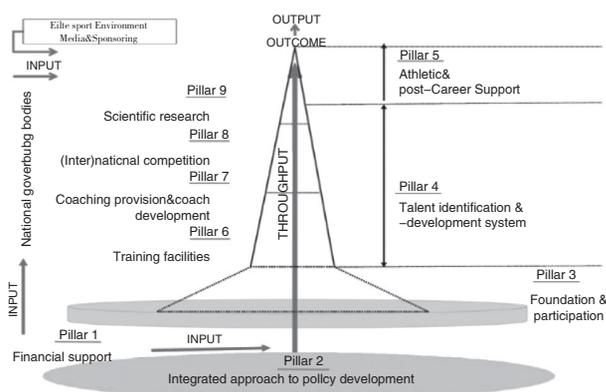


图1 运动员高水平训练阶段各类支撑因素一览
Figure 1 List of Supporting Factors for Athletes in High-level Training Stage

与国际体育强国比较,尽管我国多年来也形成了稳定的竞技体育科学研究和科技服务模式,但在选题上缺乏科技含量高的重大课题研究,在管理上基本仍沿用“小作坊”式的分散管理模式,在操作和运行上缺乏资源共享和不间断监督。这种状况极大影响了科学研究的质量和科技服务的效果,至今我国在竞技体育领域还没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研究成果,在科技服务方面也不能满足运动训练的需求。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的奥运助力工作基本局限在体育体制之内,缺乏社会科技力量的支持,更缺少国际科技领域的参与,仍处于保守和封闭的发展模式。

因此,在备战2020东京奥运会训练周期,应将提高科学研究和科技服务质量作为快速提高训练水平的另一个突破口。在科学研究上,应充分利用我国“举国体制”的优势,将全国科技力量引入竞技体育的科学研究,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选择部分具有引领性的高端研究课题进行重点投入和保障,大幅度提高我国竞技体育科学研究水平。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还要克服以奥运“时间紧迫”为借口的急功近利思想,要认识到每4年一届的奥运会不会停摆,要敢于进行跨奥运甚至更长期的科学研究工作。在科技服务上,应建立统一的管理机制,打通各个项目之间的壁垒,建立资源共享和经验交流平台,提高科技服务的质量和工作效率。同时,还要倡导引进国际高水平科技服务团队,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训练实际进行二次创新,尽快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快速提高我国奥运备战科技助力水平。

3.2 构建科学化训练团队,提高科技对训练的引领作用

世界竞技运动训练科学化水平的提高建立在近年来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基础之上,多学科和

高科技的介入也必然带来对训练团队的冲击甚至是颠覆性的改变,当前的运动训练已经不是教练员的“单兵作战”,而必须是多项教练员(体能、康复和技术)与多学科科研人员(生物力学、生理学、心理学和营养学)的复合型团队工作。根据有关报道,英国自行车是在一个由 14 个职能组成团队的指导下进行奥运参赛和训练(见图 2),他们从不同的职能或学科介入训练,从不同的职业领域和时间跨度构成全方位和动态的训练团队。例如其研发总监、工程师、物理分析师等角色很可能并不是长期跟队训练,而是阶段性地进行研究和策划。同时,需要重点提及的是,训练团队的领导已由原来的主教练或领队变成了现在的“运动表现主管



图2 英国自行车国家队复合型国际化团队 (Inghan, 2011)
Figure 2 The composite nationalization team of the British cycling national team(Inghan ,2011)

(athletic performance manager)”,该变动并不是简单的名词改变,而是一次训练团队领导职能角色的革命。由于科技向运动训练的大规模渗透和介入,科学、训练和保障的高度融合,传统上的领队或总教练,无论在知识储备还是在能力结构方面,已不能胜任当前训练团队领导的职责,该岗位需要那些具备科学、训练和管理三方面才能的新型人才,即运动表现主管进行掌控。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和国际化业已成为世界未来发展潮流之际,我国体育科技界必须站在世界的高度,在深刻认识我国存在问题并紧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科技助力奥运国际化的发展道路。在“以我为主”的原则上,以“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为目标,整合全球资源,探索奥运科技合作的新模式,构建国际奥运科技平台。在此平台上,应突破以往以引进教练员为主的国际合作模式,大胆引进国外优秀教练员背后的学者和专家,从源头解决我国教练员整体水平不高的问题。同时,还要鼓励和支持我国体育科技人员走向国际,充分利用各种国际交流渠道,选派各种类型的科研人员出国学习、培训和学术交流,尽快提升我国体育科技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能力。

创新 (innovation)、解惑 (interpretation)、信息 (information) 和提高 (improvement) 是英国给竞技体育科学制定的 4 项主要任务,也被简称为 4 个“1”。这些任务基本涵盖了科技对训练的主要助力作用,为科学研究和科技服务指出了明确的工作方向。但是,对于我国竞技运动训练来说,在 4 个“1”的基础上还应该增加一个“引领 (Leading)”的任务。也就是说,我国竞技体育研究不仅要助力训练而且还应引领训练,这种引领并不是降低、更不是否定教练员的主导作用,而是现阶段的一个有效和务实之举。应该认识到,我国竞技训练科学化程度与世界存在较大差距,该差距不仅表现在训练设备和方法上,而且还表现在教练员的执教水平和运动员参与训练的程度方面,单纯依靠训练主导 (教练员) 和主体 (运动员) 的力量很难在短期内赶超世界水平。因此,我国科技人员应该肩负较国外同行更多的科技助力责任,不仅要基于训练需求通过科学攻关和服务解决问题,而且还要瞄准国际最新发展前沿和动向,主动探索和发现我国训练存在的问题,开阔教练员和运动员的视阈,引领训练的科学化发展。

3.3 探索竞技训练的科学化发展之路

当前,科技助力已成为我国奥运训练的利器,以科技促发展,以科技补短板也已成为我国竞技

训练界的“共识”。然而,在当前国内外新形势下,如何抓住机遇、找准问题和高效发展,如何将科技助力切实落在具体项目和具体运动员的训练,是我们竞技训练界面临的首要问题。

在里约奥运会之后,我国以备战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张家口冬季奥运会为重点的竞技体育训练,其科技助力应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认清当今世界科技助力竞技训练的主要发展态势,区别“科学攻关研究”和“科技辅助服务”两类不同的科技助力形式,前者应选择那些对运动能力或专项成绩具有重大影响的关键问题进行创新和突破,后者则应在整体上提高日常运动训练的科技含量。如前所述,当前世界竞技体育发展的一个突出趋势是“三位一体”的训练模式,整体提高了训练科学化的水平,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同时,应对这两类科技助力工作采取同样的重视,但又要实行不同的投入、管理和运行机制,并在总体结构上统筹协调二者的关系,这是未来科技助力奥运的两条主要路径。

其次,精准定位和有的放矢,根据不同项目或项群的特点及其在奥运的位置采取不同的科技助力方式。纵观历届奥运会,尤其是近5届奥运会的比赛,“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是很多国家在竞争激烈、变幻莫测的奥运奖牌榜实现突破甚至一鸣惊人的“法宝”。因此,应该针对我国奥运优势、潜优势、一般和落后4类不同水平项目设计并实施不同的科技助力策略,例如对于优势项目,应在不干扰多年已经形成的训练主体模式的前提下,大幅度提高体能、康复、营养和心理等方面的科技投入,引进和借鉴当前世界在这些领域的先进理论和方法,提高训练的质量,减少运动损伤的发生,即以提高效率减少损耗的途径提升项目的国际竞争力。而对于潜优势项目,则应着力改变现有的传统训练模式,不仅在体能上而且在技术、战术等各个方面,解放思想大胆尝试新的训练方法。在这一目标下,科技助力应主要体现在新的训练理论与方法的引进、高水平教练员的筛选与评估和新型训练设备的购置与运用等方面,大幅度改变现有的训练。

第三,动员和整合社会和国际科技资源加入科技助力奥运训练的工作,建立多学科和国际化的高水平研究团队和平台,快速提升竞技体育的科研攻关和科技服务水平。在国际化高水平科技助力团队的引进和构建中,既要以“体能”、“恢复”、“康复”、“营养”、“赛前训练”等具有共性的学科为主体,解决我国竞技训练中长期普遍存在的关键问题、难点问题和共性问题,又要以特定项目或运动员,尤其是重点项目和高水平运动员为专门研究对象,进行重点攻关和精准保障。

第四,根据当前奥运备战训练的发展,对若干对我国奥运备战训练具有重大影响的课题,例如“跨界、跨项二次选材”、“夏季类冬季项目的发展”、“训练、科研、保障三位一体训练场地的建设”以及“冠军模型的制定”进行专门研究,摸清规律,探索路径,总结经验。

4 结语

在创新和国际化业已成为我国未来发展的风向标之际,在二东(冬)奥运会的严峻局势和挑战下,中国竞技体育界必须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高点定位为基准,紧跟世界发展潮流,紧扣我国训练实际,快速提升我国科技助力奥运训练的水平,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 [1] Daniel Cressey and Ewen Callaway Team Science, Nature, 2012, 487 (19): 292.
- [2] 黎涌明,陈小平.英国竞技体育复兴的体系特征及对我国奥运战略的启示[J],体育科学,2017,37(5): 3-10.
- [3] <https://bbs.hupu.com/6647151.html>.
- [4] V. D. Bosscher, P. D. Knop, M. V. Bottenburg & S. Shibl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Analysing Sports Policy

Factors Leading to International Sporting Success [M] . European Sport Management Quarterly, 2006, 6 (2) : 185-215.

[5] EIS. About us. <http://www.eis2win.co.uk/about-us/>.

Technology Promotes Olympic Training--Situation, Progress and Countermeasure

CHEN Xiao-ping

(State Sports General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of Sports Sciences, Beijing 100763 China)

Abstract : Arou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help the Olympics, service training, analyzes the situation and tasks facing China's competitive sports. According to research, from the situation of the apparent decline in the number of gold medals of the Chinese team in the last Rio Olympic Games in Brazil, China's competitive team will face a more severe situation in the 2020 Tokyo Olympic Games, ahead of the strong oppon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There are competitions in the United Kingdom, Germany, and Australia, followed by host Japan's interception. The trinity pattern of powerful opponents in the field of competitive training hardware and software as well as the complete, systematic, and scientific training sessions are analyzed. The three main tasks of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assist Olympics training are pointed out: 1. Scientific top-level design; 2.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training Team, improve the leading role of science in training; 3. Explore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 training.

Keywords : Athletics; Training; Technology; Tokyo Olympics; Rio Olympic Games

(上接第 61 页)

saving became the idealized choice in China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ilitary national sports thought.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democracy and science ,the thoughts of Pragmatic sports and natural sports and the thoughts of Nationalism sports and National sports made the people understand more comprehensively traditional sports and western sports, these thoughts made the people begin to mo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tness and recreation to the true meaning and essence of sports. That is the main feature of the change of Chinese sports view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sport changing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 also is the main feature of Chinese modern sport development.

Keyword : sports view; military national sports; democracy and science; Pragmatic sports; natural sports; National sports

心态·体制·形式

——中国校园足球改革障碍及其突破策略访谈录

孙科

(北京教育学院 体育与艺术教育学院,北京 100010)

【摘要】:面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振兴足球作为发展体育运动、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任务摆上日程的新要求,如何在新形势下校园足球工作中落实、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选择有效的路径发展校园足球,提升校园足球的整体发展水平,扎扎实实做好校园足球工作,让校园足球的发展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就显得尤为迫切和至关重要。此次访谈,旨在深入挖掘、阐释校园足球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难题,就“重压之下的心态失衡”、“条块分割的窘境”、“形式主义的批判”、“校园足球未来如何发展”等障碍性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与分析。这些讨论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清中国足球的发展道路,还可以认知到校园足球的独特价值和功能,从而有助于学校营造良好的足球文化氛围、培育健康向上的足球文化。

【关键词】:校园足球;足球文化;足球改革;中国足球协会;体育体制;青训体系;足球操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909(2018)01-0083-12

校园足球的发展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成为教育部学校体育工作开展的重中之重。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强调:“发展校园足球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总书记非常重视我国足球事业的发展,这也是广大球迷的期盼。”2017年12月27日,陈宝生部长在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暨领导小组与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签署备忘录仪式上发表讲话指出:“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扎实推进校园足球长期持续健康发展,为中国足球强起来奠定坚实基础”。

新形势下,如何促进校园足球可持续发展,解决校园足球改革发展进程中的难题,就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为此,本编辑部特邀请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体卫艺研究所所长吴键、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金汕、《体坛周报》副总编辑马德兴、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教授李永明、苏州大学体育学院青年学者邱林博士,就校园足球发展的若干个关键问题进行了讨论。

1 一夜飞渡镜湖月

孙科:在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上,陈宝生部长认为校园足球工作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他认为“有人想事了”“有人办事了”“有钱办事了”,并讲了2018年校园足球工作开展的要求或者方向,大致有五点:完善施工图、啃下硬骨头(编制、资金、场地、竞赛体系)、巩固主阵地(特色学校建设和教学、培训、竞赛三大体系建设)、奏响交响乐(多部门协作)、建好加油站

收稿日期:2017-12-10

基金项目: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足球振兴的文化策略研究”(17ATY004)。

作者简介:孙科(1981-),山东淄博人,男,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体育文化、体育口述史。

（政策支撑与激励）。吴老师，您能不能谈一下校园足球工作过去开展的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

吴 键：自 2013 年《关于加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的意见》、2015 年《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通知》发布以后，教育部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做这项工作。尽管文件发的有一定滞后性，但我们可以欣慰地说，从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三年的情况来看，教育部在推进校园足球工作当中，做出了很大的成绩。这项工作基本上从三个层面来推进：第一是国家层面的推进，要顶层设计做规划，应该是五年一个规划；第二是省市、区域层面的推进，进行综合改革试点，包括内蒙古自治区，青岛市、延边等一批城市；第三是学校层面的推进，要建设 2 万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三个层面的推进工作都非常好，现在综合改革实验区已经有 36 个，校园足球试点县 102 个，2 万所特色学校的审核认定基本完成。

从 2014 年开始，教育部投入了很大的财力做校园足球师资培训，具体由中国教科院负责。目前为止，我们培训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校长共计 12000 名，骨干教师的培训有 15000 多名，教研人员、退役运动员的培训约 5000 名，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区的行政管理干部大概 3000 名，培训力度是非常大的。这些受训的校长、体育老师回去以后，带动了全国校园足球的发展。教育部审核校园足球实行三个一票否决：学校有没有开足球课；学校有无组织校内班级的比赛；学校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有没有提高。这样的要求就是旨在引导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面向全体学生，让全国两万所特色学校里面的孩子感受到足球的快乐，能够享受到足球的文化熏陶。

特别注意的是，这三年的推进没有对运动成绩提出具体要求。这与夯实足球人才基础的想法有关，更重要的是普及足球人口。足球人口和注册球员是相对的概念。足球人口是指青少年在学校期间每周从事两次或者两次以上足球活动，而且每次活动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

注册球员是指球员在某个足球协会、俱乐部或者业余的机构里面注册。现在校园足球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普及足球、增加足球人口，这是理解校园足球发展政策的要义。从调研来看，至少在 2 万所特色学校内部，校园足球的推进工作还是扎扎实实的。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功成不必在我”、“久久为功”。现在，全国校园足球的推进工作有点着急。我也听到一种说法，校园足球工作是否有起色，要靠比赛成绩来说话。巴西 U19 联赛的冠军巴西圣保罗队 30 比 0 战胜包头四中，29 比 0 又战胜了鄂尔多斯蒙古族中学代表队。大家一看，都说中国校园足球太差了，干了三年没有什么成绩。我个人认为这个话没有一个科学的态度。我们是普通的校园足球队，他们是有深厚基础的职业后备队，没有可比性。

我设计过一个校园足球的十步走，从理念的推进、普及，到校园足球的发展等基础工作，再到理念、顶层设计、政策落地，都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需要示范引领，叫制度突破，需要科学理念的引入。再就是职业足球的发展，运动员的涵养，涉及运动员将来的职业规划。而我们目前刚走第一步，就遇到了很多障碍，就是访谈前马德兴老师所提到的：教育部门 and 体育部门的不融合，教育部门、职业俱乐部部门和体育部门不融合。比如说运动员的升学、就业问题，特别是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升学通路还没有打通。

孙 科：总结来看，校园足球发展的障碍首先就是心态的问题。从中国的竞技体育发展历程来看，“金牌至上”的政绩观导致了很多棘手问题的产生，形成了行政权力主导的体育发展观，这种发展观就是中国体育竞技心态的体现。从中国职业足球改革的发展历程来看，足协的各种规定、政策屡屡引起争议，很多足球发展规划的制定脱离实际，被很多人称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可以说，“行政与市场”的错位、缺位、越位发展，导致了 1992 年以来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失败。

足球职业化的改革对竞技足球、校园足球的发展影响是深远的。上世纪 90 年代，在职业化改革的影响下，市场化办学思潮的鼓动下，足球学校、校园足球的发展一度乱象丛生，危害了校园足

球的发展。这些都是急功近利导致的恶果,是在所谓“政绩观”、“利益观”的主导下,心态失衡的结果。现在校园足球的发展,大家都很关心,因为涉及孩子的发展问题。2016年9月26日,白岩松在第四届北京晚报百队杯论坛中谈到:“校园足球的关键不在校园里,而是在校园外,它由场地、教练员、保险三个部分构成,没有这三者校园足球不可能搞起来。一个孩子热爱足球,体育课上的时间是根本不够的,要是他们回到家里,周边没有免费或者说极其廉价的场地,校园足球根本没戏。”不知道,大家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吴键:首先要界定概念,什么叫校园足球,什么叫青少年足球。校园足球的主要任务是普及,要培养孩子的球类思维,德国就是如此,让孩子与足球一起成长。我们普及校园足球,一是为了提高足球人口,增加孩子体质;二是发现足球人才,发现学生的足球天赋。这些有足球天赋的孩子,就应该送到专门青训基地。

实际上,高水平的师资、教练大部分集中在体育部门,针对的人群就是有足球天赋的青少年,这个是校园足球做不到的。所以,校园足球发展的另一任务就是发现精英,然后送到青训基地。我们国家这方面发展得不好,体育部门的精力不足,主要是俱乐部做得多。

邱林:我同意白岩松老师的观点。校园足球的发展如果只是拘泥于学校内部,那么从长远发展看会存在一些问题。

目前,我们对校园足球的概念界定还没有很清晰的认识,“校园足球”是在2009年出现的新名词,之前称为“学校足球”。它是在我国青少年足球人口严重萎缩、学生体质持续下滑的背景下,为扩大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基数,由中国足协提出的。自其产生之后,学界对“校园足球”内涵的争论从未终止。目前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校园足球是以学校为依托,在广大学生中全面发展的以增进学生身心健康、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为目标的足球相关活动的总称。其根本目标是培养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最终目的是提高中国足球运动水平。第二种观点认为校园足球是提高广大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培养青少年拼搏进取、团结协作的体育精神,普及、提高足球知识与技能,在普通学校开展的全国性青少年足球活动。其根本目标是增强体质,最终目的是立德树人。

两种观点都是研究者根据不同时期政策文件精神推断形成的,都围绕着校园足球的本源定位论述,争论校园足球竞技性与教育性的地位与作用,探讨校园足球根本目标与最终目的所在。但两种观点却都混沌于“一元论”之中,并相互对立,没有随时代变化而赋予新的理解,掩蔽了校园足球真正的时代内涵。

2015年1月,校园足球由教育部门主导开展,回归教育本位,作为学校教育与学校体育的重要内容,其本质属性以教育为首要任务,这点毋庸置疑。而校园足球作为体育项目的一种,其必然具有一定的竞技属性,任何国家的校园足球都是其青训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培养足球后备人才,推动足球事业发展的任务。这一点在2017年全国校园足球工作计划中也有所体现。实际操作过程中,校园足球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功利主义”和“锦标主义”现象,“异化”了校园足球发展的目标,但我们决不能否认校园足球培养足球后备人才的功能,人为割裂“普及”与“提高”相辅相成的关系。

所以,我认为校园足球是以学生为主体,以学校为依托,在校内外进行的一切与足球相关的活动的总称,既有普及性又有竞技性。因此,校园足球的场域,既在校内,也在校外。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校园足球的发展将呈现出:校外比校内重要,课外比课内重要。

马德兴:发展校园足球是应该的,这毫无疑问,这就是我的回应。今年10月份,中国足协在武汉搞了2005年学段的足球训练营,一共131个孩子。从基本功和球感来看,相比以前同年龄段

的孩子，基本功好了很多。在今年 3 月份，我与其他教练员一起看了 2001 年龄段的孩子训练。我问了好几个老教练，他们说没希望了。看到了 2005 年龄段以后，感觉好多了。2001 年龄段参加的是 2024 年奥运会，2005 年龄段参加的是 2028 年奥运会，这涉及中国足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校园足球提出以后到现在，整个再去看这段历程，就以 2005 年龄段的孩子为例，足球发展的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四岁、五岁，或者六七岁的时候，已经有踢球的气氛了。我先不说是教育部门还是体育部门，也不说校园足球发展的关键不在校园，从这个角度来讲，校园足球的发展就是必要的。

李永明：白岩松谈的问题其实隐含了足球怎么发展的问题，也隐喻了当前校园足球发展的问题。教育部门搞校园足球的优势的确不如体育部门。从专业角度来看，无论从文件的制定，还是从人员的安排，都必须了解体育、了解足球，要有一定的运动经历，至少是运动体验，不论是工作的还是生活上的。如果不具备以上的特质，制定出来的文件就经不住推敲，就会出现很大的偏差。其实，教育系统也有体制衔接上的冲突，如大体协和体卫艺司。足球不管怎么发展，都不要急功近利，否则系统与系统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都会产生各种矛盾和问题。

2 君向潇湘我向秦

马德兴：我接着李永明老师的话说。坚持推进校园足球的发展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问题在于怎么搞好校园足球？我觉得首先是顶层设计，目前校园足球发展的顶层设计出了很大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校园足球究竟是什么足球，其概念一直在混淆。走到哪里，世界上只有一个足球，并不是按照地域、年龄就可以分出好多足球。德国也好、韩国也好，日本也罢，所有的地方就一个足球，最高管理部门就是足协。我之所以说顶层设计有问题，强调一个足球，原因在于全世界只有中国说校园足球归教育部门，其他足球归体育部门。所以，中国足球改革的顶层设计应该意识到这个问题，不能把整个中国足球本来复杂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孙科：如果简单，怎么简单化发展？

马德兴：如果简单化的，要在统一管理上面归口。搞竞技足球是离不开最基础的普及。任何一个国家足协的任务，第一是搞强化、搞竞技；第二个就是普及。以日本足协为例，现在日本足协的注册人数，总共才 90 多万。2005 年，日本足协提出了“2005 宣言”，旨在“通过足球创造体育文化，创造一个健康的社会。通过普及足球，把体育融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为大家创造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国内体育报道的主线一直是竞技体育，宣传报道只谈日本豪言 2050 年夺世界杯，对 2050 年之前日本足球人口增加到 1000 万提得就少。给人的感觉，日本好像只是搞竞技足球，其实人家也是搞普及的。我们现在整个的问题是什么呢？体制出现了条块分割。《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公布 50 条后，把足球分成了校园足球、竞技足球，这样又把足球给分割了，导致了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相互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我这几年跟着足协去跟教育部门一块碰头，深刻感受到教育部门是非常强势的，我一亩三分地，你别来掺和，体育部门反而处于弱势。现在足协有足协的问题，脱离体制一半之后就刹车了，往前推进的力度不够，例如选派人员的问题，应该是走选举程序的，而不是直接任命。

邱林：我认为关键是找到体育与教育系统之间真正契合点和目标方向，解决两者之间的利益矛盾，也就是发展目标和工作重心的差异。

孙科：怎么突破这个体制障碍呢？

马德兴：体制障碍不靠突破，是靠设计的。一开始顶层设计的时候，就没有设计好，组织结构、组织架构没有设计好，就很难再有所作为了。

邱林：对于“跨界”管理的校园足球而言，最大困境并非资源不足、权责不分等，而在于如何形成部门之间高效联动机制与横向联合管理格局。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或许是一种突破体制障碍的有效方式。

李永明：在我看来，中国足球的发展一直在走弯路。校园足球是2009年启动的，当时归口在体育局，中国足协搞了五年，可能会存在些问题。目前，校园足球的归口在教育部，由教育部牵头搞，也会出现很多问题。如果校园足球的发展再出现问题，下一步怎么走就值得考虑和探讨。

吴键：现在才三年，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马德兴：前面五年说不行，很重要一点，足协进不了校园，学校只认教育部门，不认足协。现在大家都说学日本，日本文部省是体育文化一起的。韩国是体育科技还有旅游是一个部。只有中国是教育部是教育部，体育部是体育部，现在体育总局严格讲起来主要是搞竞技体育的部门，负责全民体育的功能有点单薄，尽管说全民健身也是归总局管理。

李永明：有些省市的基层部门，教体局合在一起了，合在一起就解决了。

马德兴：要注意地方的差异性。各个地方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差别很大。比如说体育教育有的是合在一块的，就看一把手是不是搞体育的，可以说搞不搞体育对足球的重视情况是不一样的。

孙科：现在各个学校搞校园足球除了教育部之外，他要根据政策，其他学校里面搞校园足球是不是靠校长在推？学校也是存在这个情况。校园足球搞得如何，重不重视主要看校长重视与否，这也是体制性的问题。

吴键：我的感受也是这样。我们做校园足球校长的培训，凡是经过我们培训的，具备了校园足球的教育理念，就推进得很好。现在反而是两个群体有阻力，一个家长群体，还有一个班主任群体。班主任、家长都有面临学习成绩好坏的压力，文化课成绩是要排名的。孩子受班主任的影响最大，是特别听话的。

马德兴：现在教育部门，我个人感觉教育部门需要减负，否则很难维系。

金汕：您指哪方面的减负？

马德兴：学习文化课的负担太重。如果不减负，校园足球持续健康发展的可能性不大。

金汕：的确，教育存在扭曲，一个是变态的升学率，一个是就业过于注重文凭。如果教育这两大问题不解决，中国校园足球的发展肯定是要扭曲的。回顾历史，1957年之前就是一个社会健康蓬勃往上发展的阶段。那个时候的体育，其实就是简单几句话：一句是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一句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前面三个“好”是针对学校体育的，后面的增强体质是针对全社会的。仅有的这几句话，却产生了很好的发展效应。中国足协是1955年建的，并不是体委成立就有。那个时候也没有人说重视足协，都是以体委的名义搞比赛，学校非常重视，非常支持。

1959年9月13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运会，北京足球参赛队员多是学生选手。如陈成达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建筑工程系，苏永舜是中山大学物理系的，年维泗是北京育英中学（现北京二十五中）的，也是重点中学。那时候，教育来说和足球非常接轨的，学校就应该踢球，如果踢球好就应该抽调上来，整个的足球体系反而更接近现在的欧美。

十年文革把整个足球体系破坏了，再加上现在畸形的升学观念，要求孩子必须上大学，上大学还要照着清华、北大的目标。这是不对的，所以，我挺同意马德兴的观点，足协太弱势了，但从业务来说，足协是内行，教育部门是外行，但教育部门几乎掌握了全部的教育资源，不由教育部门主导，校园足球就开展不起来。

邱林：我赞成金老师的观点。从目前看，教育部门掌握着学校内部足球发展事务的资源和

决策权,体育部门则拥有除学校体育以外的全部体育事务的管理权,并控制着大部分足球专业资质教练、裁判、场地等优质资源。但是,长期以来由于体制壁垒和部门利益藩篱的存在,两部委之间在校园足球发展中并未形成真正的通力合作,教育、体育资源共享缺乏有效工作机制,且部门职能定位的越位、错位和失位状况依然存在。

体育部门依托自身优势专注于足球后备人才和竞技水平提高,但无法解决广泛普及和升学考试问题,就造成成材率不高、出路受到限制、规模难以继续扩大,甚至难以维持。教育部门注重于人数普及和全面发展,但难以打破足球课程教学“蜻蜓点水”的低水平现象,造成普及人数大大提升而质量难以提高。

3 愿把欢心凝乐舞

孙科:校园足球的发展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足球操”,类似的还有篮球操。针对这些操类的形式,有的专家认为可以将音乐、体操甚至是舞蹈,与运动项目结合起来,增加趣味性;有的专家认为这些形式上的东西,违背了足球运动项目发展的本质规律,对足球运动发展有害无益。“抓而不实等于不抓,形式主义害死人”,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待校园足球发展中的形式主义问题的。

吴键:不能笼统来说一个运动的发展是形式主义,前提分析出现的问题是不是形式主义,有哪些是形式主义的,有哪些不是形式主义的。现在有一个说法是小孩子做足球操是形式主义,我认为不是。我们要培养孩子的球类思维,给孩子一个球,排球也好、足球也好、网球也好,都是建构一个思维,促进大脑发展,建构一个时空概念。这个时候,孩子玩任何球都是有益的。从足球技术的本身来讲,守门员技术的实现也是通过手来建立人与球的关系。

其实从思维科学的角度来看,足球开发的是创造力。德国孩子为什么玩球,就是要促进他的脑力。我们不需要苛责他用什么球来玩。校园足球面向孩子,首先是普及以提高孩子的思维能力,提高孩子的体质健康,提高孩子的神经系统对身体机能的支配。从训练的科学性来谈,专业技术和专项素质的能力的培养,最优的年龄阶段是在 12 岁左右。

李永明:最早说校园足球发展过程中存在形式主义,就是从足球操说的,说足球操是形式主义。为什么说足球操是形式主义?学校体育要求学校要有大课间活动,保证 1 个小时的运动量,这是好事。这大课间活动做什么呢?要有一定的内容要填充,不能仅仅跳广播体操,看国家重视足球,就产生了足球操。足球操是谁编的呢?一般都是舞蹈、健美操老师编排的,这些老师不懂足球,但足球操可以编排很漂亮,加入了很多足球动作,每天跳来跳去,学生的足球技术真的能提高吗?我看未必。从这个角度来说,编足球操的出发点就是应付检查,或者是追热点、搞迎合,这样就可以贴形式主义的标签。从实际调研来看,足球操需要孩子拿球,球是不能离开身体的,离开身体就控制不了,这个足球比赛实战相差甚远。

邱林: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必须遵循其本质规律。足球运动就是足球运动,它是一种同场对抗类的运动项目,所有的教学训练都是围绕着解决比赛中的问题而展开的,绝不是拿个球在手上跳跳操这么简单。

2016 年我被教育部选派至法国学习校园足球,曾与法国专家探讨过足球操的问题,他们在 1769~1848 年期间,也曾在校内开展过足球操活动,但只是将其作为体操活动的一种形式,由于对足球运动带来了不利影响,继而终止。近期以来,我国许多地区的足球操都改为用脚来进行活动,虽有进步,但对校园足球发展容易产生异化导向,是一种弊大于利的活动形式,所以,“抓而不实不如不抓”。

金汕:过去足球的发展是投入不够,造成足球资源的贫困。现在都重视足球了,国家领导人

更是关注,拨款投入多了,所以,大家都有压力了。有压力,就得各种方式来展现其对足球的重视。足球操也算是一种方式吧。如果把足球操更多划为体操,足球是一个器具,最后落实到操上,不是足球上,那就没有意思了。在我看来,越是偏远的地方,形式主义有可能越多,大的都市如京沪反而不多。

孙科:我跟前中国足协副主席薛立交流过。她认为足球操是很受欢迎的,关键是怎么编,如果是传接配合的足球技术编排,这是可以接受的。

马德兴:中国地方太大了,情况千差万别,不能一概而论。地方上的确有一些形式主义,我也同意金老师说的,越偏僻的地方形式主义越严重,很多大城市是不存在的,确实就是这样。很多地方为了应付检查,足球器材排放都很整齐,很新,一看就没怎么用,就是为了应付检查的。检查的领导走了以后,器材室的门就一锁,这就是形式主义,搞欺上瞒下。大的城市,信息量大,信息传播也快,很多学校是不敢担这种风险的。

吴键:校园安全是很重要的,学校里安装了很多摄像头,联网以后,各个课程也都在监控之内,老师课上教什么,状态怎么样,都一目了然,这是治理课堂教学走形式主义很重要的一种监督方式。但是,很多老师是反对的,因为涉及到隐私。不过,现在家长都很支持孩子报足球培训班,市场对足球教育的需求增多,这个需求反向说明校园足球的影响力大了,而不是大家说的搞搞形式来应付上级检查。

李永明:校园足球的发展不缺金钱投入,缺乏理论的引导,缺乏体育资源的支撑。以校园足球培训为例,体育部门应该搭建一个平台,一个与一线训练接触的平台,培训不能仅仅靠讲座,一定要接地气。从培训的效果来看,集中培训的效果也未必好,很多钱都浪费在交通费、食宿费上,都贡献给铁路、旅游业了。我建议还是组建培训团队,走下去培训,可以深入到县、城镇甚至是乡村。所以,谈形式主义,还要杜绝培训中的形式主义,看似搞了很多培训,效果未必很好。

吴键:从培训角度来看,现在各大体育学院最主要的任务是培养师资和高水平教练,满足中小学特色教学的需求。我们调研了中小学的校长、教研员、体育教师,最大的感受还是体育老师的足球执教水平有问题,这是最重要的。在影响校园足球发展的诸多问题中,足球场地不是第一位的影响因素,仅仅排名第五,师资才是第一位的,涉及教学水平和带队水平。

邱林: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也曾多次表示:“校园足球发展要由追求数量转向提高质量。”怎么提高质量?就要看教学、训练、竞赛三大体系的完善。这三大体系的核心则是教练员,或者说是足球教师。高质量的教学、训练和竞赛都需要依托高质量的教练员(足球教师)团队。2009年之前,学校足球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踢球的孩子太少”;2009年至今,校园足球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会踢球的教练员太少”。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顶层设计入手,统一规划中国青少年足球教练员培训体系,推进教育系统足球师资培训与中国足协教练员培训体系的有效衔接与融合,充分利用足球协会优质足球讲师资源,提高教练员培训的专业化水平。

金汕:当今青少年足球与校园足球最大的困惑是师资,在这方面日本的经验值得借鉴。日本足协不断向各级教练员灌输他们的强化指导方针,提出新的教练认证制度,2009年时在日本足协注册的足球教练总人数高达61291人。2012年在日本足协注册的,由日本足协发执照的教练就达到了七万多人。为了给日本的青少年球员创造良好的足球环境,日本足协非常重视J联赛对青少年运动员的影响。当J联赛中优秀的国外选手退役后,日本足协给予他们以最优惠的待遇,让他们能够留在日本指导青少年训练,使青少年选手有更好地模仿和学习技术(中国的中超做不到,因为球员收入过高退役后留不住,但甲级尤其乙级、丙级等次级联赛乃至其他赛制有一定水平的球员可以)。教练员的培养与普及,一直就是日本足协主抓的方向。在2010年日本足协的预算中,关于教

练普及事业这一项的支出就达到 33 亿日元,仅次于日本国家队相关事业支出的预算。

李永明:目前师资的现状是专业技术水平高的没有理论,理论水平高的没有专业技术水平。现在推专项培训,有的地方真的缺老师,这帮球员技术很好,但是要解决教师资格证的问题,这些球员又考不出来。我想,师资培训应该从高校就抓,课程培训和培训主体要重新设置。

每年国外引进的优秀教练员,应该放到大学去,让外国教练培训高校教师,然后再扩展培训。现在说缺师资,换个角度来看,师资也可以说不错了。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没有必要非得用专业水准的运动员或者毕业生去小学当老师。现在最缺的是球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老师培养成有球探思维的人,把有天赋的小孩能够挑出来,送到专业的后备队去培养。足球发展需要全员育人,不能仅仅是足球教师,校长、班主任、各个科的教师都应该喜欢足球,至少对足球感兴趣,这样足球文化才能培育起来,才能杜绝形式主义,发自内心地来发展足球。当然,全员都有这个球探思维就更好了。

试想一下,如果语文老师是个足球迷,他就会在课堂上通过各种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足球的发展在球外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认为现在有关政策要求其他学科老师不能兼任足球教师,是值得商榷的。

孙科:您谈的是教育部印发的《学校体育美育兼职教师管理办法》(教体艺〔2017〕7号)。这个文件制定的初衷是技能化思维发展体育,很多兼课老师体育技术不专业,影响了孩子的运动生命历程,失去了生长性。一定程度上来说,我是认同这个文件政策精神的,动作教学的不规范有可能会让孩子失去专业发展的机会。文件规定:“体育兼职教师的选聘对象应是其他学校专业体育教师,校外教育机构、体育运动团体与体育系统的有关体育工作者;具有较高的体育艺术专业技能水平,一般应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在相关体育、艺术领域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士。”

这里边规定很清楚,关键词就是体育系统内。不过,具体来说,体育教师从事的运动项目不同,一人兼几门体育课,也会出现很多问题。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情,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问题在于,不能一棍子打死,搞一刀切,搞一个大门槛,这样就是一项事业的发展禁锢住了,迟早会失去活力。难道体育教师形式上都是体育专业的,就能教好足球?就跟足球教师难道一定能教好足球的道理是相通的。

在我看来,不管是什么学科的,懂教育的、专业的、职业的且具备长期从事某一项运动的实践经历,最好是具有某项运动的级别资质,这些才是最重要的。例如,一些高水平运动员以及退役的运动员,本身从事的不是体育教育工作或者不在体育系统,也不是那么有影响力和知名,长期的训练经历也能够支撑其运动技术的传授。

李永明:这个文件的出台是有背景的,是为了确保体育教师的数量。现在足球老师是结构性的缺编。结构性缺编是什么?总的编数不缺,但是足球老师缺,就是其他学科老师编制占了足球的编制。

金汕:大家谈到的是师资准入问题,中国有六万合格的教练支撑校园足球的发展吗?没有。一定程度上我是同意孙老师所说的,你不能让一个乐盲教音乐,也不能让一个球盲教足球,更不能让一个不懂足球的体育教师教足球。即使找一个体育出身的不懂足球的,也是没有用的。

年维泗亲口告诉我,他去匈牙利学习足球,先跟宾馆服务员踢球(1:0赢了),练半年后再跟田径队踢。我们的球员一看,自己的确技术太差了,真得好好训练,不练对不起国家,一千个农民供一个人出国,费用太高了。后来,这帮球员偷偷练,结果遭到了国外教练员的批评,说我们球员越练越不规范,形成了很多坏毛病,越练越麻烦。所以,我们的确不能让不会踢球的来教足球。

邱林:我认同孙老师和金老师的观点。学生年龄阶段是足球技能形成的黄金期,错误动作技

能形成将难以改变。通常情况下，不会踢球的足球教练员带队教学、训练、比赛，怎么可能传授给孩子正确的技术动作？自身就无法进行正确技术动作示范，何谈传授？2016年走访某省校园足球师资培训班发现：培训时间短，多数学员是学校从事足球以外的体育教师，没有足球基础。这种对没有足球基础的体育教师进行的短期培训班，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校园足球师资短缺的问题。青少年足球发展需要“教练为先”，如果缺乏会踢球的足球老师，学生足球运动员的水平就不会迅速提高，严重校园足球的健康发展。

李永明：我也同意孙老师的“不能一刀切”。不过，校园足球的开展主要在校园，是针对学校的学生开展的，是启蒙阶段，不要求教师有专业球员的技术水平，可以先培养兴趣，再强化技能训练。我也同意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正如什么样的教练有什么样的学生，教练水平越高，对学生的技能发展越有好处。

马德兴：从技术传授上来看，一张白纸反而没有事。从管理来看，现在教育部门越来越强势，门槛搞得越来越高，弄得形式上看着很专业，其实并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因人而异的。

4 问渠哪得清如许

马德兴：校园足球怎么发展，核心问题就是顶层设计。顶层设计需要对整个中国基层的情况要很了解，不能不了解就制定政策，否则会出现偏差。社会的普遍心态是调侃、讥讽足球。我们不要因为国家队的成绩不好，竞技成绩不好，就说中国足球的形象不好。我还是强调一点，怎么成绩不好了？是什么原因造成不好的？回到校园足球本身，我们要搞清楚为什么要发展校园足球，需要把这个问题先弄清楚。

金汕：上世纪90年代，秦皇岛的中国足协建立之后，其他足球学校就如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了。很多足球学校开办的目的就是挣钱。有一句话很经典，“只要有钱，坐着轮椅来也收”，甭管什么豆芽菜，小胖墩，完全从盈利角度出发，这绝不是搞校园足球、足球学校的初衷。

孙科：说白了足球的发展就是市场化、职业化、产业化，但这不是发展校园足球的初衷。

马德兴：谈到这里，我想中国校园足球改变与教育产业化有关系。

金汕：其实民国开始就建立很好的学校制度，我也研究过北京的体育，当时就是一些学校的联赛已经相当不错了。建国以后，中国开始学习苏联设立体校。

目前为止，最适合中国体育的就是业余体校，三级训练的体系。后来为什么中国足球发展的不理想，主要是搞俱乐部了，不用体校体系。到了最后，最能够把体校和青训体系结合起来的机构也没有了。德国很多专家谈德国足球与英超的最大的区别，就是青训系统的不同。巴西和阿根廷的足球非常普及，为什么这些年不行，因为靠街头足球的方式成为足球强国的历史一去不返了。所以，普及是普及，真正拿成绩的还要靠青训。

邱林：接着金老师的话谈一下青训与校园足球的关系问题。从“大青训”的角度来看，校园足球应该属于足球青训的塔基，也是最为重要的环节，这也是中国足球青训的发展方向。我们不能一谈青训就是竞技，就是提高，一谈校园足球就是兴趣，就是普及。

目前，我国足球青训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纵向上普及与提高两大层级呈割裂发展态势，具体表现为：体育与教育部门之间存在一定的利益藩篱，难以形成通力合作；校园足球与U系列竞技足球的发展理念不统一，没有衔接点；校园足球后备人才怎么选拔、培养和输送，缺乏一条明晰的人才培养与输送路径等等。横向上青训主体相对混乱，各主体之间相对孤立。我们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把握好青少年足球普及与提高的协同发展问题，处理好政府、学校、俱乐部、协会等多元主体的合作关系，在逻辑上解决“普及”与“提高”的矛盾。

近日，中国足协公布了30个新部门的设置，特别增设了男子青训部和女子青训部，教育部公布

2017 年全国校园足球工作计划中提出研制校园足球“满天星”精英训练营建设方案,加之去年开展至今的校园足球高水平队伍参加的“青超联赛”扩军等。种种迹象表明,校园足球将在中国足球青训中发挥重要作用。

马德兴: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大家一直批判业余体校,批三级训练体系。我个人感觉业余体校支撑了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有没有问题?肯定有问题,问题在于顶层设计,即我一直强调的“条块分割”。业余体校属于体育部门,不属于教育部门,也就是说,它是游离于教育体系之外的,这样就会导致教育的资源没有向业余体校倾斜。职业化兴起以后,出现很多足球学校,也包括现在的恒大足校。这些足球学校的问题很明显,就是得不到教育资源的倾斜。新的情况是,很多专业队都以整队的形式进入到了各个地区的优质学校、重点大学,这是很不错的做法。发展校园足球,应该把中国的三级业余体校制度重新恢复起来,核心问题就是教育部门敞开胸怀,接纳这些运动员。

举个例子:1991 年 9 月 1 日,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其间业余体校制度取消。1994 年广岛亚运会,乌兹别克斯坦拿了冠军,靠的是前苏联业余体校培养出来的那拨足球运动员。2006 年,乌兹别克斯坦开始改革,总统授权乌兹别克足协“指挥”人民教育部、高等及中等职业教育部、文化和体育部,强制性地建立“足球学院”、每个州都至少要拥有一所寄宿制足球学校,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大学都衔接起来,类似三级训练体制的业余体校。我们国家现在搞足球学校,都是全国省市集中到某一个地方,如恒大足球学校,周边全是陪读的。而乌兹别克斯坦的孩子不用离家很远,就有足球学校可以上,能够接受高水平的培训。这些靠什么,必须靠顶层设计,要求每个省市都要有高水平的足球学院、足球学校。

现在教育部门成立一个足球专家委员会,很多专家全都是足协的,都是体育界的,这就是重叠。今年的青超联赛,各个俱乐部的梯队、省市体育局的队伍,还有学校的队伍都能参加。那它的目的、出发点是什么?谁来主导?足协那边的本意是希望打破教育和体育的壁垒,教育口这边希望能够主导,争取更多的学校能够参加,提高校园足球的竞技水平。

最终参加青超联赛的,一个年龄段的队伍,真正高水平的队伍没有进来,进来的都是教育部门搞的那种特色学校。结果打比赛,一打就输 10 个,输 8 个,输 7 个,这种比赛的意义不大,说白了就是政绩观的问题。

孙科:从几位专家的观点来看,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的协作尤为重要。校园足球出现的问题,“根”在于部门之间的分割,执行的时候表现在各管一摊,这是体制性融合的问题。我知道金油先生有个很鲜明的观点就是“足球从爷爷做起”,这是邓小平同志提出“足球从娃娃抓起”观点的延伸。无论是娃娃、爸爸、爷爷,这里边都会涉及一个问题,就是足球文化的培育问题。

文化是什么?足球文化是什么?我想逃脱不了热爱足球的氛围、喜欢足球的热情和把足球作为生活方式的态度。问题是怎么热爱足球?足球是不是代表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是不是刻有锻炼人品质的基因,是不是一种健康的文化,这都很重要的。恰恰在我国,足球成了一种“恶俗”的调侃,甚至烙印上“不干净”的色彩。我想,校园足球首先必须是纯净的,能够让孩子真正体味到快乐,而不是“唯竞技”,搞一些所谓的手段、技巧,获得一些成绩,校园足球应该是健康文化自觉笼罩在各种手段之上,不能让工具性的东西将文化破坏殆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思考,我们怎么在校园里把足球扎根,形成比较好的校园足球文化?

吴键:要调动孩子的天赋、天性,孩子喜欢玩,充分给他玩的机会。所以我们现在要求小学阶段足球玩起来,开一些趣味性的游戏,对抗的、游戏性的、小场地的比赛,开展游戏性的班级比赛,每个孩子都参加,而且真正卷入到游戏里面,这样才会让人格培养真正的定型,光说教是没有用的。现在倡导的规则意识,集体主义意识,一定要在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建构。所以校园足球

的文化建构,校园足球建构什么文化,重点就是教会人们去爱国、爱集体以及顽强拼搏精神的培育,足球绝对不仅仅是竞技,如果落地到学校,年纪越小,游戏性就要越强,然后慢慢发展技能。小学玩起来、踢起来,中学赛起来,这些都是校园文化培育很重要的理念。我还要强调一点,校园足球的发展、校园足球文化的培育需要融通,需要足球协会、足球社团盘活,我们不能光听、看,而不去做。

马德兴:文化、教育、体育要统一起来。中国足球发展最关键问题需要立体化的体系。今年,上海全运会拿了4个项目的金牌,但队伍里面有几个是真正的上海人?全运会完了以后,这些外地运动员怎么办?下一步的学籍怎么解决?全运会之后,80%的足球运动员在中国足球界消失了。他们干什么去了?有没有高校能接收这些运动员。

所以,改革一方面要创新,另一方面要考虑现有的资源和人。中国的校园足球发展,应该依靠足球俱乐部建立从小学到大学一整套的衔接体系。现在广州富力足球俱乐部就这个模式,把校园足球、专业足球、职业足球整个渠道打通了。这个必须得到教育部门的大力支持,如果教育部门不支持,俱乐部是进不了学校的。

李永明:这个体系,成长渠道好几个,踢球好的运动员可以去职业俱乐部,淘汰的运动员继续读书,最后可以考综合大学、体育高等院校或者专门的足球学院。

邱林:如何降低青少年足球人才淘汰率的问题也是校园足球文化形成的一种保障机制。踢球的孩子被淘汰的少了,或者说可以继续攻读学业,那么家长就会放心让孩子踢球。我国现行的足球后备人才培养路径存在“单向化”问题,就是“踢得出来,你就成才,踢不出来,你也成材”。一旦球员没有进一步发展,被淘汰,就会面临“无学可上,无球可踢”的窘境。

我们可以借鉴法国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一些先进方式解决此类问题。法国足协在全国建立了15个精英训练中心,通过精英选拔赛挑选13岁学生球员召入训练中心进行2年培训(13~14岁是初中3、4年级,是职业规划选择关键期,被挑选球员基本选择职业足球,其他球员则选择继续攻读学业),所有费用由法国足协承担。其间,球员参加全国选拔赛应召进入职业俱乐部梯队或国字号球队。

对于未被选拔进入精英中心的学生球员,则可以进入高中继续攻读学业,足球就成为一项终生体育爱好。这样就可以降低学生球员职业规划的风险,在关键时期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职业风险降低了,家长至少不会过于反对孩子踢球,有了大量的校园足球人口基数,也就有了校园足球文化形成的保障。

马德兴:我主张用球队、校队,学校足球队取代足球特色学校,这个更有现实意义。足球文化少不了竞技运动,离不开学校足球队的带动作用。搞两万所足球特色学校效果远不如搞两万支校园足球队更有现实意义。

我认为每个学校都应该建自己的校队,只有这样才能把校园足球真正的带动起来。校队是整个足球学校的龙头,这就好比国家足球队。为什么说中国足球不好,很重要一点是中国国家队踢得很差。这就是示范作用。如果龙头搞好了,整个带动作用是不一样的。如果这个校队能够组建起来,那么它对整个学校校园足球的开展是有带动作用的。校队训练、比赛的时候,就会吸引很多学生围观。日本也有校园足球,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搞足球,而是他们有一支很强的校园足球队。

金汕:开展校园足球要因地制宜,北京的弱项是场地缺乏,但其他方面有自身优势,而且有多种模式。北京有了一种京西训练营模式,有别于探索当年的人大附中模式。虽然人大附中模式为人所羡慕,但并非所有学校都能提供如此大量的资金与设施以保证三集中模式的运行。

近年来,我市的一些足球人参考国外经验,开始推广一种新的青少年足球培养模式,即训练营

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学生平时在学校上课,俱乐部派教练员到学校进行选材并培训体育老师,平时由体育老师负责学生的课余训练,在周末俱乐部会挑选有资质的学生集中到俱乐部的训练营,由专业教练员进行直接辅导。目前活跃在石景山区的京西训练营就是以这种模式在该区建立了 16 所网点校,校均 50 多名学生,注册 1300 余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种模式可以推广。

5 结语

振兴中国足球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已经成为建设体育强国,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只有加快普及校园足球,才能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和足球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青少年足球的发展首先要依赖各级教育部门、学校与社区之间的通力合作,多元主体发展校园足球理应是校园足球发展的常态。鉴于中国体制的特殊性,体育与教育部门归属的主体不同,如果协调不利,就会产生各种利益上的冲突,造成了校园足球发展的内耗、障碍。

从长远来看,中国校园足球的发展任重而道远。我们不仅要有好的观念、理念,还要有好的心态,不能急功近利;不仅要抓普及,更要抓提高;不仅要讲究部门间的协同,还要讲究部门的融通;不仅要重视足球的育人功能,更要重视足球对人美好生活的促进作用。从诸位专家的观点来看,通过引进来、走出去的方式,抓紧培养“优秀足球教练”,以俱乐部为抓手,以各省市高水平的足球学院为依托,建立起从小学到大学完整的足球教育培养体系,才是校园足球发展的上策。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加快实现《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提出的“促进青少年足球人才规模化成长”。

Attitude, System and Formation: Interview of Barriers and Strategy on the reform of Campus Football in China

SUN Ke

(Faculty of Art and Physical Education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Beijing 100010 China)

Abstract :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as the core has making a request on prompting football to develop sports undertaking and construct world sport powerful country, so it is quite important and vital to implement the sprite and find a efficient approach in the practice and implement of campus football. The aim of this interview is to find and elucidate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reform, and to analyze “the attitude’s unbalance under heavy pressure”, “the awkward situation of segmentation”, “formalism criticism”. How to implement and implement the spirit of the party's 19th Congress in the new situation of campus football in China, choose an effective path to develop campus football, improv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level of campus football, and do a solid job of campus football, so that the campus The development of football on a correct path is particularly urgent and crucial. This interview aims to dig deeper and explain the problems that arise during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ampus football. It has conducted extensive consultations on a series of major obstacles, interviewed experts, consulted their opinions, and focused discussions on key issues among them. There are many experts who have their own unique insights and the deep backgrounds and reasons for generating these insights. All these discussions are helpful for us to recognize the developing road, value and function of China football, thus helpful for constructing football culture atmosphere and cultivating healthy football culture for China campus football.

Keyword : campus football; football culture; football reform; CFA; sports system; training system for youth; football gymnastics